

不是每个人都欢迎她——高敏,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器官捐献协调员。在有些人看来,她是个“不吉利的人”,一个傻子,一个添麻烦的多事者。

而那些愿意捐献遗体器官的病人或家属,也只有通过电话里听过她沙哑的北方口音后、在面对面坐着一同落泪后、在她代办大至转院小至买车票等诸多事宜后,才会慢慢建立起对她的信任,并且,依赖她。

多年来,高敏时常在这两种遭遇中游走,撕扯与矛盾。对她来说,每一例器官捐献,其实都是一个难题。

生死使者: 器官捐献协调员



福州两位老人在福州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花
资料图片

稀里糊涂成为协调员

44年前,高敏出生于山东省商河县农村。26岁时,她离婚了,为帮妹妹带孩子来到深圳。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踏上了买菜路上的献血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2000年参加红十字会主办的一次献血者联谊晚会时,她借着昏暗的灯光填了一张表,“稀里糊涂”地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双肩包、白T恤、牛仔褲和球鞋,高敏以这样的标准装扮常年行走在路上。除了每月由红十字会报销300元电话费和一些打车费外,她没有一分钱酬劳,生活全靠在深圳的妹妹接济。

1999年,深圳有了第一例眼角膜捐献。但直到2005年,高敏才开始对器官捐献有所了解。那年夏天,在红十字会值班时,高敏接到了一个来自湖北省天门市的电话。一位名叫金省的18岁女高中生,遭遇车祸后脑死亡。她的妈妈曾在深圳打过工,自愿捐献女儿的多个器官。

“她那么聪明、那么漂亮,用她的器官救活的人肯定也一样,这样,我的女儿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电话里,这位妈妈边哭边说,恳求高敏帮忙的声音却异常坚定。

“处于极度悲痛的时候,妈妈会把一种寄托和希望想得特别美好”,同为母亲,高敏有了帮助她完成心愿的责任感。她被打动了。自此,她进入了这个以前“提起来就疼得慌”的领域。

而现在,她经历得似乎又太多了一点。

小女孩喝的汤太烫,食道肿大引起窒息,没了;司机为车胎充气,内胎爆炸将人甩出几米远,也没了;还有一次,她才帮一位捐献者填好志愿书,正慢悠悠坐着公交车往家走,一个电话过来,刚才还精神着的病人也没了。

就在这一大堆触摸死亡的过程中,高敏从只会做饭看孩子的家庭保姆,渐渐成长为知道如何赔笑脸、如何安慰家属、如何请领导出面协调关系等诸多杂务的志愿者。

“做点好事怎么这么难”

在高敏之前,深圳有一位著

名的眼角膜劝捐员陈淑莹。在得知高敏即将揽下这摊活计时,她辗转找到高敏,只说了一句话:“这件事儿很苦,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高敏起初不以为意——她觉得自己与陈淑莹不同。陈淑莹是“劝捐员”,而她是“协调员”。这意味着,她不需要向陌生人搭讪或游说,只有本人或家属明确表示了捐献意愿后,她才会进入工作。

但现实远没有她想得这样简单。

深圳一些医院里,放置了器官捐献宣传资料台。大部分被填写后扔进玻璃箱的捐献志愿书,“近亲属资料”一栏为空白。高敏便一一打电话过去问本人:“你的家人知道吗?”“不知道,我都是成年人了,我的事情我做主。”大多数人这样表述。

2003年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规定了身后捐献人体器官应符合的诸多条件,其中一条是,“死者近亲属书面同意”。这意味着,不论捐献者生前是否签署了志愿书,或是口头表达过意愿,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近亲属身上。

有时,意向捐献人已离世,而近亲属却没有通知高敏。那些塞在背包里的捐献志愿书,有一部分很可能已经成了废纸,高敏却仍不知道——志愿书没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却也脆弱,能轻易地被阻挠、被忽视和被推翻。

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内地各红十字会累计登记捐献遗体者6.78万人,但最终实现捐献意愿的只有8400人。现实情况是,本就少得可怜的捐献因各种因素而一次次流产。

2010年,东莞一个27岁的小伙子黎宏,半夜上洗手间时摔跤磕到后脑,突然去世。与他同在一处打工的亲姐姐,决定捐献他的器官和遗体。然而,姐姐无法做主。黎宏虽未婚且丧父,但远在广西老家的母亲健在。要完成这件事,必须有她的书面同意才可以。这位70多岁的老人终于在第二天凌晨赶到医院。在儿子的遗体旁,老人哭到天亮,眼睛哭到睁不开。高敏在一旁陪着流泪,又难受又焦急:“别走一个还搭一个,我的罪过就大了。”最终,黎宏的遗体完成捐献,可惜有些器官已过了最佳捐献时间,未能成功。

空白的烦恼

2009年2月,志愿捐献器官的病人郭光明在中山市一家民营医院去世。高敏立刻赶去。

本来院长、医生都很配合,不料医院老板担心病人家属找麻烦,授意医务科科长拒绝此事。这位科长把住手术室的门,高喊:“看谁敢动?我下命令,看哪个护士敢给你开这个门?”最终,高敏不得不另外联系医院,将病人和家属统统拉过去。这一折腾,又耽误了十多个小时。

“医生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有人来奉献爱心救命,你为什么拒绝一个善良的要求?”高敏始终不解。

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尚没

有一部专门法律,能够确定器官捐献者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制约、纠正或惩戒这种阻挠,当然,更谈不上激励捐献遗体器官。

曾有一对老人找到高敏,提出捐献遗体的条件:“如果我们捐献遗体,将来儿子要是找不到工作,国家能帮助解决吗?这是我们唯一的后顾之忧。”一位绝望的父亲,向她“请教”不损伤器官的自杀方法,想以自己的身体换得病女的新生:“如果我自杀并且自愿捐献器官,我的女儿是不是可以得救了?”

自己都没有经济来源的志愿者高敏,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今年4月,她在新华网发展论坛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届时,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万一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捐献何种器官做出选择。”在美英等发达国家,这已形成制度。然而高敏担心的是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她每次上高速,应急车道俨然成了超车道,遇上塞车更是挤得满满当当,“就算别人愿意捐,救护车也飞不过去啊!”

他们都是睡着的好人

“您愿意在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吗?”在新华网论坛的“PK台”中,只有四千多名网友表示“愿意”,却有八千多名网友表示“不愿意”(截至2011年10月22日零点)。“死要全尸、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还在不少中国人的意识里存在——包括一些医生在内。

有一次,她对深圳一家民营医院的副院长说,能不能在他那里放一个器官捐献宣传牌。这位副院长吓得连忙摇头:“不行不行!要是把眼角膜捐献出去,那不成了瞎子了?下辈子生出来,肯定也是个瞎子。”有一对父母,在自愿捐献了女儿的遗体后没几天,哭着给高敏打电话:“他们都问我,你把女儿卖了多少钱?我受不了了。你把女儿还给我!”放下电话,高敏第一次失眠了。

“不接受捐献的人,可能有很多个不同的理由”,高敏说,“而愿意捐献的,可能只有一个理由。”她始终记得一位女孩去世前对她说的话:“让其他人不会像我这样,这么早就离开自己心爱的人。”

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每年仅有大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治疗,同时约有150万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这个更为悬殊的数字,使高敏觉得不得不继续。

有人批评她“好大喜功”。也有人在公交车上、机场里认出她,鼓励她。天桥上的行乞者向她打招呼,清洁工把从家乡带来的大柿子留给她。一位捐献者的妈妈,在母亲节时,特地发来短信祝她节日快乐,让她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但她刚刚失去自己的女儿。高敏常常受宠若惊。如果不是这些善意,她很难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不久前,一位护士长问高敏:“接触那么多遗体,你晚上会不会害怕、不做噩梦吗?”

她回答:“为什么要害怕?他们都是睡着的好人。”

陈薇 《中国新闻周刊》

MTV:纵横三十年

2011年8月,洛杉矶。这个时代最红的女歌手Lady Gaga扮作无名小卒叼着烟卷在烟雾缭绕中走上舞台,用长达八分钟的脱口秀加钢琴弹唱表演震撼了全场观众。

1981年8月,四千七百公里外,纽约,电视荧屏出现了一个新的频道:伴随着阿波罗登月画面,一个名叫约翰·莱科的无名小卒对电视观众大喊道:“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摇滚吧!”三秒钟零六秒后,这个名叫MTV的音乐电视频道开始走入它的大时代,约翰·莱科正是其创始人之一。

1981年8月至2011年8月,整整三十年。

MTV杀死广播明星

“简陋的月光背景下一个穿红色工装裤的小女孩在收听一台旧式广播,在老派的电子合成器音乐伴奏下几个披头士扮相的男歌手不断闪现,煞有介事地唱着:我们已经走得太远,我们无法倒转。哦,录影带杀死广播明星……”这是英国乐队巴格斯(The Buggles)的音乐电视《录影带杀死广播明星》。

1981年8月1日,MTV电视台用这支略显粗陋的音乐录影带揭开了MTV的大幕。尽管巴格斯这支短命的乐队在出版了一张专辑后就不知所踪,但MTV电视台的出现却彻底改变了人们通过广播电台收听音乐的习惯。

MTV最初的理念是: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播放音乐录影带。一开始,MTV的创始人们完全不知道观众是否会喜欢这样一种全新的电视模式,他们有点忐忑不安。

三十年后,MTV成了覆盖全球171个国家的电视台,由它引起的音乐录影带形式也成为歌手们不可或缺的演出形式,那些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更被称作“音乐电视一代。”

也许以《录影带杀死广播明星》作为MTV的首播节目只是一个玩笑式的噱头,但MTV的确确成了用录影带造星的基地。观众们也不满足于仅仅守着收音机倾听好声音,他们需要更具有表演天赋的明星。

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1983年圣诞前夜,拥有作词、作曲、场景制作、编曲、演唱、舞蹈、乐器演奏等非凡天才的迈克尔·杰克逊在MTV首映了14分钟的音乐录影带《战栗》,当日就创下了一千万人的收视纪录。这支录影带不仅瞬间将迈克尔·杰克逊推向了全球巨星的顶峰,也成了音乐录影带史上的经典传奇。

“我要我的MTV”

三十年来,MTV一直站在流行的最前沿,不仅缔造明星,也创造新理念。

1984年,MTV创建了“前20名MV倒数放映”的模式。这个模式被全球音乐节目沿用至今。

同年,麦当娜在MTV电视台举行的第一届音乐录影带大奖颁奖典礼上表演了她的成名作《宛如处女》。麦当娜的紧身胸衣婚纱、故意露出的花边吊带袜以及大量的性暗示动作震撼了上世纪80年代的观众。从麦当娜之后,“性感”不再是音乐节目的简单语词,而成了音乐录影带的常生态。

1985年,MTV开创新地地让它的摄像机工作了16个小时,在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和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之间来回切换,将为埃塞俄比亚饥民募捐的Liveaid义演进行了全球直播。

这次由U2、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皇后乐队、麦当娜、大卫·鲍依、齐柏林飞艇……参加的演出成为演出史上的经典,MTV的这种直播形式也成了后来各大电视台仿效的榜样。

1986年,MTV开播名叫“120分钟”的节目,专门播放小众的音乐录影带。著名的朋克乐队涅槃在MTV向全球首播了《仿若青春气息》。涅槃之后,美国主流乐坛开始接受朋克音乐等非主流音乐。

毫无疑问,多变的MTV对上了年轻人喜欢新奇和酷的胃口。

奇幻的音乐录影带、年轻VJ、有关乐团的新闻与纪录片、时下最酷的音乐和最流行的语言,这些恰恰是年轻人所需要的。

时至今日,年轻人依然是MTV的高收视群。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许多广告商愿意以1万到2万美元的价钱去买MTV一个30秒的贴片版花的重要原因。

不只活在音乐里

动画卡通片、真人秀、恶作剧、情景戏剧……没错,这仍然是MTV。实际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MTV主要组成节目已经属于非音乐性质了。

1990年,MTV新闻栏目制作了一个荣获多项奖项的节目《90年代的性》(Sex in The 90's),深度探讨了针对性这个问题美国人态度的变化。而在另一部热播情景剧《真实世界》里,MTV通过讲述一群来自全国各地拥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陌生人聚在同一屋檐下发生的故事,对许多年轻人热衷但禁忌的话题进行公开讨论,如同性恋、滥用药物、歧视等,其中所传达的宽容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上弱势群体态度。

1992年6月,MTV播出了节目“选择还是失败”,鼓励青年人参与到国家事务和政治中来的政治宣传活动。准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参加了这个节目,这次节目使得当年的青年投票数增加了20%。

谁将杀死MTV

早期的MTV曾经是一切酷东西的集合地,追求个性和特立独行,但随着电视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一味的媚俗和过度的娱乐化已经成为MTV身上的毒瘤。有学者甚至严厉批评道,为了迎合年轻观众的“恶趣味”,MTV已经走向了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方向。

尽管覆盖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但在许多地方,MTV已经不再打着音乐标签了。在英国,MTV UK已经不再播放任何音乐录影带,主要播放《奥斯朋家庭》这样的真人秀节目。而在中国台湾,MTV是一个奇怪的购物台。在中国大陆,大多数的电视观众或许只记得“感谢CCTV感谢MTV”这样一句口头禅。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传统电视媒体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社交网站和视频网站的兴起将更多的年轻人分流出了MTV的收视群,年轻人不愿意浪费过多的时间守在电视前从一大堆MTV里等着看最喜欢的那一支,他们只要点开Youtube,就可以看到最新最热的MV,同时可以分享给其他同龄人。

MTV的老板看到这样一种变化,将MTV拥有的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音乐录影带带到了网上供网友观看和分享,这样的盛举实在让人不得不对它充满好感。

虽然早在1985年美国“Dead Kennedys”(肯尼迪家族死光光)乐队就高喊“MTV滚出电视”,但看看二十八届颁奖礼的星光无限就可以知道,时至今日,至少在美国,MTV仍然璀璨如花。至于未来的MTV将去向哪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终结?谁知道呢?也许今年MTV颁奖礼的最佳流行录影带将给出答案——“就这样共舞直到世界末日”。

杨程屹 《看历史》